

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在1930年代中国的 舆论传播效应

阎书钦

【摘要】1930年代,中国社会形成了以苏联经济建设为榜样的思潮。这源于苏联一五、二五计划建设成就在中国的舆论传播效应。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传播者和受众涉及社会各方面人员,但国人传播苏联经济建设信息有其特定的时代视角、倾向与国别语境,因而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在各类社会人员中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反应。在日本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期望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精神,加快中国的经济建设。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国人传播的苏联经济建设信息不免存在相当的片面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功之路由此进入中国建设工业化国家发展轨道的预盼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将为之而奋斗!

【关键词】1930年代;苏联经济建设;中国舆论传播

【作者简介】阎书钦,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石家庄),2024.2.118~130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30年代国统区舆论界苏联观研究”(15BZS082)。

1928-1937年,苏联通过实施一五、二五两个五年计划建设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快速发展。苏联这一经济建设成就对1930年代中国各界民众乃至国民党当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和思想影响。在此期间,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存在一个广泛的舆论传播过程。对于1930年代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舆论传播效应,学术界迄今尚缺乏专题性研究。其中的问题在于: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在社会群体中的传播态势如何?国人在传播此种信息过程中存在怎样的视角和倾向?信息受众对此种信息产生了怎样的思想反应?本文以《大公报》资料为主,兼及《独立评论》《中苏文化》《经济学季

刊》《中央日报》《俄罗斯研究》等报刊资料,对此问题作专题性研究。

一、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群体传递

公开认可和推崇苏联经济建设成就,是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共识。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存在一个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在各社会群体间的传递过程。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传递群体主要包括各类访苏人士、报刊记者和编者、国民党当局官员、以《独立评论》作者群体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济学者、专业学会成员、实业界人士、文艺界人士以及其他社会人员。

在1930年代,苏联是国人往来中国与西欧间

的重要陆路通道。有的人在途经苏联时下车作实地考察,有的人仅在火车上观察沿途苏联经济建设情况。他们向国内传递了大量的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并且所传递的信息存在一个由负面向正面的转变过程。1930年代初,一些从西欧经苏联回国的人对苏联形成了人民生活困难、粮食缺乏、商业萧条的印象。韩有刚于1930年夏游览莫斯科市容时,看到面带饥容的市民排长队领取面包的情景。^①李彦士和沈嗣芳于1930年8月在莫斯科观察到,市民“无不鸠形鹄面,形同乞丐”,该市商品缺乏,国营商店“并无货物,仅于橱窗内陈列物品数种,均系陈旧之货”。^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校长颜文梁于1931年7月介绍他不久前途经莫斯科的观感时说:“人民穿的衣服不整洁,破得无从说起。”^③这些路过苏联的人士对苏联的参观大多为自由行动。这些人之所以对苏联的印象不佳,既有此时苏联一五计划实施尚未过半、其经济成果尚不显著的因素,也有因自行游览看到了更多的苏联负面景象的因素。从1931年起,途经苏联的人传递的苏联经济建设的正面信息越来越多。1931年春,在德国留学的国民党人士萧淑宇在由中国返回德国的途中,从火车车窗看到苏联的农村和城市建设“很有一种新的精神”^④。生活在南京的夏鸣读了萧淑宇的文章后,于同年6月17日在《大公报》发表文章表示:“苏俄这一种精神”说明“愈是刻苦自己,勉励自己,他的效果愈是扩大”^⑤。丁文江在由美国华盛顿回国途中,于1933年8月底至10月上旬在苏联进行考察。在参观巴库油田时,他注意到苏联石油产量的增长速度是同时期其他国家所不及的。^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廷黻在赴西欧途中于1934年8月下旬至11月上旬考察苏联,他感到苏联的建设和生产好于

一般国家,“从建设及生财方面看,也没有问题,是在普通国家水平线之上”^⑦。

一些到苏联的短期旅行者也在国内媒体上发表文章,介绍其对苏联经济建设的观感。1932年7、8月间,署名“惜梦”的人计划经苏联海参崴到东北参加抗日斗争,但被苏联海参崴当局拘捕。他看到了海参崴破坏和建设两方面的气象,介绍说:“在新旧的楼房,在开闭的店铺,在街上络绎不绝的行人的衣饰上、精神上,都充分地表现着革命后破坏与建设两面的疤痕。”^⑧一位随苏炳文抗日部队退入苏联境内的陈姓人士于1933年4月16日描述说,他在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火车上经常看到很粗的大工厂烟囱冒着“插天凌云的黑烟”^⑨。梅兰芳剧团成员郭建英于1935年3、4月间赴苏联演出回国后撰写的《梅剧团游俄记实——在西伯利亚途中》大量描述了苏联建设情况,他看到行驶于西伯利亚的每列火车上“都悬挂着五年计划的图表”,认为这“给予乘客对社会主义苏联的认识”。^⑩

有关媒体记者的实地采访,也向国人传递了大量直观的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天津大公报社派曹谷冰于1931年3月至6月在苏联采访了三个多月。回国后,他将在《大公报》发表的20多篇通信、5篇《游俄印象记》,又补充了3万余字,于同年7月底辑成《苏俄视察记》一书。曹谷冰采访的地点是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安排的,在抵达莫斯科后,苏联相关部门送给他大量的参考资料和图片。之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派员导往各处调查”^⑪。关于曹谷冰报道中的片面性,《大公报》社评有所说明:“本社记者所视察,乃限于苏联政府许可外人视察之地域与机关,而其不欲外人视察之地域与机关,则不知。”^⑫天津大公报社聘请的驻

苏记者陈丕士向国内传递了大量苏联工业建设信息。例如,其于1933年5月16日介绍,“苏俄四五年前,仍属农业国。现已为极发达之工业国家”^⑬;1935年6月18日,其又介绍,“苏俄现一变而为工业国家”^⑭。

报刊编者是当时对苏联经济建设信息最为敏感的人群。曹谷冰撰写的通讯对天津《大公报》编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1931年6月3日和4日,该报刊登曹谷冰描述乌克兰工业建设和第聂伯河水电站的两篇通信。为此,该报于6月4日发表社评表示:“今观特派员屡次通信,不得不承认苏联建设规模之大及其进步之猛。”^⑮该报编者在社评中对苏联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深信不疑。1930年12月28日该报社评称,一五计划建设促进了苏联经济发展,“五年工业化计划,著著进步。虽反对之者,亦不能不表示钦佩”^⑯。1937年5月19日,该报社编辑马季廉注意到,苏联生铁产量已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⑰报刊编者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推崇,促使他们在报刊上大量刊登关于苏联经济建设情况的报道,这些报道又成为当时中国舆论界苏联经济建设的重要信息源。例如,1931年1月,《大公报》密切关注当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一五计划第三年度(1931年)计划。1月7日,该报报道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一五计划的讨论情况。^⑱1月16日,该报报道了会议通过的庞大的1931年度经济计划。^⑲1932年1月,苏联各大报纸公布二五计划大纲,《大公报》立即于1月28日大篇幅报道了苏联二五计划大纲的内容,并介绍说二五计划“较第一五年计划,尤为宏伟,至足耸吾人之视听也”^⑳。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报《中央日报》特别关注苏联二五计划的实施情况。例如,1936年1月,苏共中

央全会审议1935年五年计划实施情况,讨论1936年五年计划实施方案。该报于1月13日对会议情况作了长篇报道。^㉑同年6月19日,该报又刊发消息介绍1936年下半年苏联二五计划建设的具体安排。^㉒这些报道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读者,使人们对苏联五年计划建设成就感到震惊,看好苏联发展前景。中苏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中苏文化》杂志刊登了大量宣传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文章,是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重要传播源。例如,1936年6月15日该杂志发表的漆琪生的文章介绍,苏联二五计划正在以巨大规模和速度推进。^㉓同年12月1日发表的钱穆的文章介绍,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稳固的基础”^㉔。1937年8月1日发表的陈羲伯的文章介绍,苏联工业建设“确已飞腾直上,驾凌欧洲,赶上美国”^㉕。

国民党当局人士既是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受众,又是重要信息传播者。他们既相互传递信息,又向社会传播信息。国民政府赴苏外交人员的考察活动大多是在苏联相关部门安排下进行的,其所见多是苏联光鲜的一面。莫德惠率领的中苏会议^㉖中国代表团在1930年5月至10月的参观活动中看到了苏联经济发展的潜力:“俄国党政工作,确极认真,五年计划,若能成功,亦不过新国家建设之萌芽,前途所需要之努力,尚未可限。”^㉗到莫斯科向莫德惠一行传达国民党当局指示的乌泽声,于1930年10月回国后向记者介绍,他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看到,“各站多有将成未成之新建筑及新式农具,乃苏联五年实业计划之端也”^㉘。莫德惠于1931年2月回南京汇报工作期间,告诉蒋介石、王正廷、胡汉民等人,斯大林正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其政策现为制造本国之经济实力”。随莫氏回国的外交部科长李琛向南京记者介绍,

苏联领导人推进国家建设的态度非常坚决，“史达林(斯大林)现厉行五年实业计划，只求达到其所企图之目的，虽一切牺牲均非所顾忌”^②。1931年3-4月间，驻德国公使蒋作宾在回国途中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对苏联建设气象印象颇好。离开莫斯科前夕，他对曹冰谷说，苏联“建设精神殊堪重视，国人应多加研究”^③。中苏复交后，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在任期间参观、访问了不少苏联工业城市。例如，他于1933年8月参观了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④离职后，他于1936年9月对记者说：“过去在俄所得观感甚佳，苏俄第二五年计划完成，但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少。”^⑤外交部部长罗文干于1933年9月至10月自新疆经苏联回国。他于同年11月向记者表示：“俄国社会之猛进，实令人佩服。”罗文干的随员林东海也对记者说：“苏联第一五年计划业已成功，预料其第二个五年计划收获尤巨。”^⑥外交部派往新疆的特派员吴霭辰自新疆经苏联回南京。他于1934年4月6日在南京向记者介绍了苏联大量出口货物以换取外国机器的做法。^⑦除外交人员外，国民党当局还向苏联派了一些考察团，如1934年2、3月间由杨杰率领的军事考察团，10月由俞飞鹏、徐庭瑶、毛邦初等组成的军事交通考察团。他们也向中国社会传递了不少苏联经济建设信息。杨杰于1934年3月8日表示，“对苏联新建设印象尤佳”^⑧；10月14日，俞飞鹏等表示，“留俄时间虽短，然得观察各项新建设，至为满意”^⑨。

国民党当局人士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言论成为媒体上的重要舆论声音。国民党当局中央部门官员发表了不少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言论。1930年7月25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沈苑明称，苏联土西铁路的交通价值堪比中国大运河、苏伊士

运河、巴拿马运河。^⑩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孙科提到，五年计划如果成功，苏联“绝不会再为外国的市场”^⑪。1934年5月20日，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仲鸣说，二五计划期间，苏联计划建设2.5万至3万公里的新铁路，“且拟扩充电气化路线数案”^⑫。一些国民政府经济部门很关注苏联经济建设情况。“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主持拟定的1930年度财政报告书认为，“五年计划之伟大程序，将使苏俄成一完全工业化之国家”^⑬。1934年5月，实业部国际贸易局起草的1933年度中国国际贸易报告提到，苏联于1933年开始的二五计划“已立定下年之稳固基础”^⑭。“苏俄建设事业”也成为1935年4月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研究的重要事项。^⑮一些国民党当局的地方官员发表了不少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言论。1934年1月11日，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青海省主席马麟等赞赏苏联引进西方技术的做法，说道：“苏联五年计划，亦借欧洲技术而成功。”^⑯1934年10月17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说，苏联、意大利等“新兴国”在各种事业方面“无不蒸蒸日上”^⑰。1936年9月12日，阎锡山在山西造产救国社会会议上提出，“把俄国斯达汉诺夫运动方法，应用在本省的生产上”^⑱。1936年9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说，苏联国力“所以能有异常的发展，也是全国上下一致经济建设的结果”^⑲。

1930年代，中国各类社会群体大都感受到了苏联经济建设成就。以《独立评论》作者群体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深受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感染。1932年8月28日，翁文灏将苏联建设工作视作中国“拼命赶的榜样”^⑳。1933年7月16日，蒋廷黻认为，苏联将“宗教的热忱”和“科学的物质设备”相结合，肯定会有巨大的发展。^㉑1935年1

月6日,陈之迈认为,苏联通过五年计划建立起了“现代经济制度”^④。诸多经济学者非常看重苏联经济建设成果。李权时于1932年5月注意到苏联一五计划中的工业发展计划。^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丁洪范、鲍觉民关注到苏联经济建设。丁洪范于1935年8月28日称,“苏联经济集团”已成为与“美系经济集团”“英系经济集团”“法系经济集团”并列的经济体系。^⑥同年12月16日,鲍觉民注意到,苏联第聂伯河水电站已成为“世界最大电厂之一”^⑦。不少专业学会成员感受到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东北矿学会会长薛桂轮于1930年10月26日认为,苏联矿业“日进千里”^⑧。1933年8月29日,中国工程师学会武汉分会会长邵逸周说:“我国之两大强邻,日本炼钢达二千万吨,苏俄亦五百万吨。”^⑨一些民族资本家感知到了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天津永利碱厂厂长李烛尘于1931年4月在参观日本东京第三次化学工业博览会苏联馆时,看到馆内“壁画上所映写之五年计划,均着着进行”^⑩。1936年10月10日,创办上海新亚化学制药公司的许冠群说,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轻重工业,相继告成”^⑪。1937年4月,经销苏联缝纫机的上海协昌东记公司老板沈君山计划派其子赴莫斯科考察缝纫机制造业,以便中国自行制造缝纫机。^⑫文艺界人士经常在文艺评论和文学作品中赞美苏联经济建设气象。1933年8月31日天津《大公报》刊登的中篇小说问道:“看看现在左倾的苏俄,五年计划为什么能够成功?”^⑬同年11月18日天津《大公报》刊登的介绍苏联小说的文章将苏联五年计划建设视作世界经济危机中“繁荣的孤岛”^⑭。张央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大公报》发表影评说:“莫斯科早已成为新的莫斯科了!”^⑮

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在中国社会传播广泛。

1935年4月12日,南开大学电台通过无线广播方式向社会播送了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全国电气指导主任恽荫棠写的《苏俄的电气工业》一文。^⑯从《苏俄视察记》销售量和热销时间亦可看出此点。该书自1931年9月1日出版至1932年1月初的四个多月内,印刷3.5万册。^⑰该书至1936年仍在热销。^⑱同时,1932年1月至1933年春,大量盗版本遍布北平(今北京)、天津、太原、张家口等地大小书店。^⑲该书在当时的读者群是很大的。例如,在天津《大公报》社工作的杨历樵于1932年2月在回家乡无锡的火车上,见到车上乘客“有阅读本社所出《苏俄视察记》者”^⑳。

综上所述,在1930年代中国各类社会群体中频繁传递着苏联经济建设信息,而且涉及的社会群体范围广泛。其中,访苏人士的观感是最直观、最生动的信息来源。这个时期的访苏人士包括民间人士和国民党当局人士两类。民间访苏人士又包括途经苏联的人士、短期旅行者、媒体记者等类。而国民党官方人士以外交人员为主,也包括其他类型的访问团。相比而言,国民党当局人士的访问行程基本上都是由苏联方面安排的,而民间人士的访问行程除苏联安排外,还有个别自行游览的成分,会接触到一些多面相的情况。总体而言,当时中国访苏人士的行程以苏联官方引导居多,而苏联为了宣传其建设成就,往往会带他们参观积极正面的场所。这使得他们的观感与苏联的真实情况之间存在相当的偏差。

二、舆论传播的视角与倾向

1930年代,国人在传播苏联经济建设信息时具有其自身特有的视角与倾向,这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发展困境、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民族危机及国人寻求国家经济发展的愿望等因素密切相

关。同时,分析这种视角与倾向,亦有助于分析当时国人看重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思想原因。

首先,国人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传播具有如下三种视角:

第一,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视角。

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一方面,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衰退,另一方面,苏联在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快速发展。这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国人将苏联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行对比,从而形成了苏联经济迅速上升、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日趋没落的认知定式。《大公报》在一系列报道和文章中反复申述这个观点。1932年1月4日,该报在报道中将苏联称作“世界经济萧条怒潮”中的“繁荣之孤岛”,认为“在今日世界皆一致向下,苏俄各经济因素,则表示向上”,“各国工厂倒闭,而苏俄新建设工厂,动称世界之最大者”。^⑥1935年1月31日,吴辰仲在该报发表的书评表示,1929年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严重衰退,而同时“在世界经济恐慌的环境下,苏联的经济不但没有一些恐慌的影子,而且,那被斥为梦想的五年计划更能于四年内完成,农工业生产力都已追上最前进的资本主义国家”^⑦。《中苏文化》杂志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说明苏联经济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倒退的情况。于苇于1936年10月15日描述说:“苏联的建设上的结果,与陷在经济恐慌的泥沼中、走到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衰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一方面是‘向上涨’,一方面却是相反的‘向下落’。”^⑧方秋苇于1937年3月1日感叹说,在全世界经济危机日深的情况下,苏联是一道仅存的亮丽风景,“只有全世界六分之

一的苏联,在这战争与恐慌弥漫全世界的今日,它是一年比一年繁荣,的确堪称黑暗巨涛中的一座照耀万里的灯塔!”^⑨

第二,中国经济建设视角。

国人关注苏联的经济建设,并非仅就苏联说苏联,而是有着强烈的中国经济建设关怀。此时,国人已深切认识到中国与苏联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实业家穆藕初于1936年9月13日注意到,苏联自1920年代出台新经济政策尤其是一五、二五计划以来,经济建设成就惊人。而中国工农业生产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日益减少,“若言生产,十年来非仅未见增加,且反形减缩”^⑩。同年10月12日,张其昀提出,河北省经济发展仅属零散、局部性质,衰退仍为主流。由此,他想到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建设的巨大进展,并将之与孙中山《实业计划》作对比,深感中国经济的停滞。他说道,“彼苏俄第一次五年计划既提前成功,第二次五年计划又将完成”,孙中山《实业计划》撰于1919年,尚在苏联实行一五计划之前十年,“惜先生建国之理想,至今尚为悬谈,破坏已多,建设太少”^⑪。国人关注苏联经济建设亦与1935年国民党当局开展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有关。1937年5月1日,南京《苏俄评论》编辑朱惠之即称:“在一年前,当我国提倡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时候,我就想到苏联工业建设的成功史。”^⑫如此,国人在谈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问题时主张借鉴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1937年5月,汪惠波表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今日已由理论之探讨,进而为实践之策划。”他注意到,中国米麦每年有大量入超,导致巨额白银流向国外,杂粮却有出超。他建议,中国应学习苏联两个五年计划中“国民皆宁愿吃黑面包,而将小麦倾销于世界市场”的做法,多消费杂粮,

少食米麦。^③

第三,中国民族危机视角。

1930年代,国人对苏联经济建设进程的关注度随着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上海抗战”“长城抗战”“华北事变”这几个时间节点而步步提高。在民族危机视角下,国人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主要关心三方面问题:其一,以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提振国人进行中国经济建设、增强国力、抵御外侮的信心。1931年10月2日,高永晋提出,国人应有进行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应知耻而后勇。他以苏联一五计划建设为例说:“苏俄施行‘五年计划’,尚未完成,即能令彼列强感觉威胁。故收回我主权,恢复我领土,苟万众一心,绝非难事。”^④同年12月3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以苏联埋头建设使国家富强为例来告诫国人不要灰心丧气:“彼在四面楚歌之境遇,而能着着实行其工业计划,全国之人,节衣缩食,力图建设”,“中国在此创巨痛深之时,惟有全国同胞一致发生深切之觉悟,对过去大忏悔,对未来大奋斗!”^⑤其二,学习和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做法与经验,全力推动和开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以充实抗日国力。1932年2月12日,署名“天民”的作者提出:“至于救国之道,治本之计,则俄国五年计划,大可参照。”^⑥1933年10月1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提出,在日本占领东北、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应像苏联制定并实施一五计划那样,制定并切实执行国家建设的长远方针,“苏联采用第一次五年计划,振兴重工业,一切建设,均按整个计划,着着进行,遂令举世不得不改容相看”,“此无他,能刻苦努力,进行有计划之程序耳”。^⑦其三,分析苏联经济建设对中国抗战国际形势的影响。1932年1月15日,张毓宾分析,苏联一五计划建设的成功促成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

变。日本急于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资源,苏联“已经实行到三年的五年计划,尤使日本朝野寝食不安,感觉有急速并吞满蒙之必要,迟则恐难如意了”^⑧。张毓宾此论得到《大公报》编者的赞同,该报于同年3月28日发表社评指出,日本之所以贸然占领东北,对付苏联五年计划建设造成的军力强大是一个重要因素,日本“畏虑苏联五年计划完成后之军备进步,而适乘欧洲之多事,与美国海军尚无意向远东取攻势之事实,对内对外几经酝酿,然后决心为此猛烈之一击”^⑨。1936年12月3日,胡适分析,苏联五年计划建设及其导致的苏联国防实力的增强对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影响很大。“苏俄自第一五年计划成功后,第二五年计划亦将告竣,不论在军事、实业诸方面,俱有极大之进步。尤其军备方面,诸如陆军之机械化、空军数目之庞大,在在均予日本以威胁,而使日本在太平洋上,有后顾之忧。”^⑩

其次,国人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传播具有如下三种倾向:

第一,重视苏联工业建设的倾向。

国人大力宣传苏联工业建设的高速度。1936年12月1日,钱穆介绍,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机器制造业”得到“昂进”。到1936年,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大部分机械设备实现了自给,“就全部机器之总产量言,苏联已占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其中,农业耕作机的生产,竟突过美国,雄居世界第一位了”^⑪。谢世珍于1937年2月23日指出,“在苏联第一次五年计划的结果,虽认为不能完全成功,但就其工业发展的速度,实有惊人之处”,苏联重工业产品,“如炼钢、采煤之类,不但不仰给他人,还能供给别的国家了”。^⑫至1930年代中期,国人认定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实现了工业

化。吴景超于1936年11月1日将世界工业化国家分为美俄式、英日式两类。^⑧可见,他已将苏联视作与美国一样的工业化国家。同年12月1日,《中苏文化》编辑袁孟超说道,实施二五计划以来,苏联已经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的猛进中,成为了占欧洲第一、占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国家”^⑨。1937年5月1日,黄甘棠介绍,苏联党和政府致力于工业化建设,“不到几年工夫,居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近代的工业国了”^⑩。

第二,宣传苏联建设精神的倾向。

介绍苏联建设精神的文字,时常见于1930年代报端。这是因为在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民族危机的境遇中,国人鉴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中国民众的庸散苟且,期望国民党当局和中国民众学习及发扬苏联人民、党和政府的建设精神,推进中国经济建设事业。国人将苏联建设精神理解为如下五个方面:其一,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刻苦努力的精神。1932年1月29日,《大公报》发表文章强调,国人在“多难”之中,只有像苏联人民那样发愤图强,才能兴邦。^⑪同年4月23日,《大公报》发表散文,钦佩苏联人民的刻苦工作精神:“苏俄近年来的繁兴,也全赖他们的民众不断从刻苦中谋出路的结果。”^⑫同年9月20日,《大公报》发表散文感叹说,苏联人“是如何勇敢,努力啊!”^⑬1934年10月10日,《大公报》编者在纪念双十节的文章中指出,国人应发扬苏联人民“埋头苦干”的精神,继续努力。^⑭同年10月12日,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召开的第二届乡村工作讨论会上说,苏联的成就是其人民“由认清题目,埋头苦干中间得来的”^⑮。吴景超于1935年11月3日提出,希望国民党当局像苏联党和政府那样“苦干”与“有计划的干”。^⑯

其二,举国一致的团结精神。1932年4月9日,《大公报》“现代思潮”版编者发表文章说,苏联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只因为他们整个的民族,全站在同一的立场上,一齐往前干”^⑰。何廉于1935年1月16日说,苏联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举国一心,众志成城,破釜沉舟,坚忍前进,竟以四年之期间,完成五年之计划,一跃而为工业强国”^⑱。其三,勇于征服自然的牺牲精神。1934年1月30日,三位苏联航空专家乘气球升至2万多米高度,但在下降过程中,因事故而遇难。^⑲对此,同年2月8日,《大公报》发表小品文,热情赞扬苏联人民为征服大自然勇于牺牲的“民族性”。^⑳其四,人民与政府切实合作的精神。陈谷声于1932年11月11日指出,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是因为他们的人民能够和政府一心一德、刻苦耐劳所获的结果”^㉑。其五,党政官员廉洁奉公的精神。1931年10月22日,徐东林表示非常羡慕“苏俄军政要人,谋国的忠诚,建国的苦劳”^㉒。1932年11月7日,《大公报》发表社评表示,苏联党政官员的廉洁奉公值得中国学习,“对于其国执政者之勤俭勤劳,与人民同甘苦,掌政权十五年而无腐化之名,则至宜借镜,以资勉奋”^㉓。

第三,既对苏联宣传抱有好感又在主观上想尽力介绍苏联经济建设之不足的倾向。

国人在认知苏联经济建设时,既对苏联宣传抱有好感,又在主观上想尽力介绍苏联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由于对苏联宣传抱有好感,媒体受苏联宣传影响,传递的信息有诸多失真之处,其对苏联经济建设的评论和感受,有的是以一些失真信息为基础的。由于在主观上尽力介绍苏联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媒体的一些报道与评论又反映出了一些有关苏联经济建设存在问

题和不足的真情实况。

国人对苏联关于本国建设成就的宣传是抱有好感的,认为苏联的这种宣传反映了苏联的实际。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于1933年6月14日在伦敦经济会议上称:“苏俄因特别经济及政治制度,未受资本主义国家所蒙受之经济恐慌。”^⑧同月16日,《大公报》发表短评说,李维诺夫所言确为苏联的宣传,“其实,宣传无用,最雄辩的是事实。苏联是否有经济恐慌,这是事实问题。若事实如此,难怪他宣传了。换句话说,假如资本主义的各国,能解决了世界恐慌,那么,也就不怕它宣传了”^⑨。1933年7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对记者大谈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苏联一五计划取得巨大成功,苏联“已成为一工业国家”;苏联的外交成就乃基于国内建设的成功,“因苏联内政之成功,外交随之亦获得胜利”。^⑩是月8日,《大公报》发表短评认为,鲍格莫洛夫所言“极值得中国人的倾听”,“五年的岁月,是很短的。我们在混乱中浪费地度过,人家却拼命地在建设上显了成绩,可见事在人为,祸福都是自造”。^⑪

在受苏联宣传影响的同时,国人又在主观上想要尽力客观地介绍苏联经济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1930年8月25日,《大公报》发表短评分析,苏联过于偏重工业,导致农业与工业发展不平衡,进而引发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苏俄表面上是劳农并重,实际上总是把工人的利益看得重些,工业品显然有压迫农产物的趋势。因此,便发生出农民怠业、食粮缺乏种种不良的影响,工农之间也显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恶感存在。所以,农村与城市的冲突,在这个红色国家里,闹得或许竟格外重些,亦未可知”^⑫。对于1932-1933年乌克兰等地大饥荒,中国媒体是有所报道的。1933年4月21

日,《大公报》报道,乌克兰居民“现因饥荒,皆向大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哈(尔)科夫等处逃难”^⑬。1934年6月3日,《大公报》刊登短新闻称:“按去春苏俄荒灾,饥死百万人。近因得甘霖,或不致再演惨剧,但若干区之人民,已因饿而患肿。”^⑭

综上所述,1929年经济危机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与苏联两个五年计划的高歌猛进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国人从感性上看好苏联经济发展进程。同时,国人将中国经济的落后和停滞与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行对比,更加高看苏联经济发展。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国人急于找寻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充实抗日国力的路径,因而看重苏联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和做法。在工业化思潮日益兴盛的情况下,国人特别重视苏联的工业建设。为提振中国建设精神,国人大力阐释苏联建设精神。国人对苏联经济建设的看法,既深受苏联宣传的影响,又力所能及地介绍苏联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一定弊端和不足。

三、信息受众的思想反应

1930年代,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在中国各社会群体间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各界对苏联经济建设成就有着不同程度的了解。同时,国人在传播苏联经济建设信息过程中又有其特有的视角与倾向。那么,各信息受众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信息产生了怎样的思想反应?

苏联经济建设的巨大规模和发展速度给国人造成了强烈心理冲击。1931年5月中旬,曹谷冰参观正在建设中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惊异于其建设规模之巨。他在大坝工地上看到,大坝两侧的水面高度约相差8米,“水流湍急,为向所未见,激荡之声,无殊万马奔腾”,并想象到大坝建成之后

的情形：“异日全堤竣工，两旁水面将差三十六米达以上，则其水流情形，又不难想象得之也。”^⑧从对苏联经济建设规模的惊羨，又进而发展为对中国经济停滞、落后的深深忧虑。1932年2月5日，《大公报》刊登小品文，在介绍苏联一五计划建设“远超预定”的同时，反观中国，自叹不如：“我国亦号称革命之邦，今日言建设，明日亦言建设，徒见险象环生，抑又何世？”^⑨同年8月5日，《大公报》刊登警句说：“苏俄五年计划成功了。我们也有什么森林计划、三年计划，但毕竟说是说，做是做，即或实行起来，弄些‘相应函达’‘等因准此’的玩意儿，便会占去全计划的一半时间。”^⑩1933年5月13日，《大公报》刊登文章，将苏联石油开采业与中国石油开采业进行对比，感叹苏联石油开采业发展之快、中国石油开采业之落后。此文注意到，苏联石油开采业“有凌驾美国之势”，而中国却极端落后，“中国的煤油只得完全仰给于外国了”。^⑪这就形成了国人看待苏联经济建设的从下往上仰视的心理。曹谷冰回国后于1931年7月10日发表文章说：“要是有一个工业先进国家的人往俄国去考察，或许不会得到这么一个印象。那么，我便很老实地说，任何中国人往俄国去考察，他得到的印象，一定会比欧美人不同。譬喻说罢，在我们中国哪一个人、哪一处地方所用的电灯泡是本国自造的？我们见了俄国电业托辣斯所属的工厂，每天可以制造电灯泡十二万枚，哪能说他不是一所大工厂？”^⑫显然，在中国根本谈不上工业建设的情况下，曹谷冰对苏联工业建设的成功之路不无羨慕。

国人将苏联一五、二五计划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与1929年经济危机导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衰退进行对比，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阻碍

经济发展。1937年5月1日，《中苏文化》刊登的两篇文章表达了上述看法。黄甘棠注意到，自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生产，年复一年地衰退”，而“苏联的工业生产，却年年增加”，“这正活绘出‘恐慌’与‘建设’的大分野”。^⑬秦涤清分析，苏联工业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苏联最近十年的努力，已赶上一九三二年的美国，即美国费了六十三年（自一八六九年至一九三二年）所经过的路程，苏联在十年间就走到了。因此，苏联工业发展的水准虽然不及美国，但是，它那种发展的飞快的速度，却不可轻视。”^⑭

对苏联经济建设的羨慕与认可，导致国人普遍主张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精神和经验。其中，主张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精神，是国人对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最明显的心理反应，此种心理反应涉及人群相当广泛。新闻界人士主张学习苏联建设精神。1936年4月30日，《大公报》在介绍即将完工的西伯利亚铁路双轨建设时发表短评说，“近些年俄国人也在咬牙，使劲，故也不可侮”，苏联人的这种精神值得中国人学习，“东方几个大国，日俄都有她们的‘立’劲，中国却懒洋洋的躺着，不想爬起来，岂不羞愧煞人？中国人啊，我们要立志爬起来”^⑮。一些淡出政界的北洋政客亦主张学习苏联的建设精神。在日军攻陷山海关的情况下，段祺瑞于1933年1月24日提出，中国应发扬苏联举国团结、努力建设的精神，以增强国家实力，从而消除外患。他表示，山海关失守，国人必须自救。如果中国早作对付日本的准备，“不要说一个日本，即十个日本，亦不足畏”。他以苏联为例说：“我不观新兴之苏俄乎，其朝野一心一德，努力于国是，故有今日之发达。”^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量国民党当局人士主张学习苏联建设精神。蒋作宾

从苏联抵达沈阳后,于1931年4月27日向记者表示,苏联最令人惊叹者即“现在苏联全国同心戮力,吃苦耐劳,省衣节食,齐向建设道上努力”,中国应学习苏联的这种精神,“其建国精神,则诚堪令人钦佩而资效法”。^⑩1935年8月12日,李宗仁以苏联埋头建设的精神为例,说明中国人民只要发愤图强,国家的前途就会有希望。他表示:“俄国在欧战的时候,国家祸难也很严重,但俄国国民,能够牺牲奋斗,整理内部,抵抗外患,后来,又节衣缩食,埋头建设,结果仍能使俄国国基,日趋巩固,国际地位,亦一天天的提高起来。”^⑪1937年元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广播演讲,以苏联人民艰苦奋斗的建设精神勉励国人,身处国难之中应自力更生。他表示:“苏联于推翻旧俄政权后,国家地位也是非常危险,但是,因为全国人民都能在新经济政策指导下,埋头苦干,努力奋斗,数年来,就变成农业、工业都很发达的国家。同时,也完成了强大的国防计划。”^⑫

国人主张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具体经验。《大公报》编者主张学习苏联五年计划的经济效率。该报于1931年1月5日发表社评提出:“观于苏俄五年计划之效率,窃愿政府与国民,亦宜明定年限,急起自奋也。”^⑬1935年10月28日,丁洪范将苏联强制人民减少消费以积累工业建设资金的政策称为“强制积储”“自力积储”政策。他力主中国应学习苏联此种做法: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资本来源应以本国的资本积储为主,因而必须采用强制储蓄的办法。^⑭1936年1月,《申报》社主任会计孙洁人提出,中国应学习苏联特许外国人经营某些工业的做法,“吾人固不反对举借外债,以及准予外人经营本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彼苏俄行之而无流弊,足资引证”^⑮。1936年7月29日,杨

学通以苏联经验论证中国聘用外国技术人员的重要性。他表示:“我国技术人才缺乏,故于利用外资时,须同时利用外国人才以增高生产效率。苏俄五年计划之成功,固由政府人民之努力,但德、法、英、美、荷兰、瑞士、日本诸国七千以上专门人才之功劳,亦未可泯灭。”^⑯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于1936年在不同场合提出学习苏联通过压缩人民消费积累工业建设资金的做法。他相继在3月21日南京首都讲演会上,在6月16日中央广播电台讲演中,在7月4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中国人民应学习苏联人“吃得少,穿得少,住得少”,“吃得坏,穿得坏,住得坏”,以积累资金购买外国生产机器的做法。^⑰1936年11月,陈行提出,在外国侵略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应学习苏联一五计划重点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做法。他注意到,苏联“第一五年计划,乃积极举办重工业,厉行节约政策,输出农产品,以换取生产机械”^⑱。

国人纷纷以苏联经济建设为例证,阐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大公报》编者以苏联为例,提出中国应制定远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并发展国营企业。1931年6月4日,该报刊登社评分析,苏联取得经济成就的关键在于政府有远大的计划,“苏联现政府之可称者,则在有整个的远大之计划,自根本上建设起来”。所以,中国“整个计划,应参考苏联”。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大多亏损,“是以在现状之下,以私人资本创办大规模工业之事,殆完全绝望。故建设之前提,非望国家主办大工业不可,非大体上学步苏联计划不可”。“凡重要工业,应积极国营,此可学苏联。”^⑲历史学者连士升以苏联一五、二五计划的巨大发展说明,中国经济由沉沦到复兴的历史必然趋势。他于1936年

10月9日分析,近80年来,中国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弄得百业破产,民不聊生”。俄国在十月革命前,“何曾不是腐败不堪。然自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之后,接着又实行第二次五年计划,发展集体农场,振兴大规模的重工业、轻工业,提高而又普及教育,注重国民的健康,十年之间,就称霸全球了”。如果中国努力开展经济建设,“我们不但能转危为安,而且,我们相信,一二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也可以变成世界上一个最富强的国家”。^⑤吴铁峰以苏联开发西伯利亚的成就说明中国开发边疆的紧迫性。他于1937年1月1日分析,苏联西伯利亚日益成为铁路网的重心以及“新兴工业和农业的重心”。他提醒大家,中国的蒙古、新疆、西藏同样属于资源丰富的边陲之地,但仍处于未开发状态。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应该学习苏联开发西伯利亚的做法,中国“‘开发西北’的口号虽然唱了几年,但是,有谁会脚踏实地去做呢?”^⑥

国民党当局在将苏联经济建设成就视作对中国的威胁的同时,又在实际事务中借鉴苏联的一些做法。1931年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说:苏联中亚地区棉花生产,“其突飞猛进之数量,势将以中国为尾闾”,环绕新疆边境的土西铁路与深入东北的中东铁路,“左提右挈,势成常山之蛇”。^⑦刚考察苏联回国的蒋作宾担心苏联强大后会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他于1931年5月18日分析,“苏俄一旦五年计划完成,自必谋向外发展。欧美对此防御殊严,恐不易侵入。我国与苏俄接壤万余里,尤为彼邦所垂涎”^⑧。国民党当局试图在国家重要事务决策中借鉴苏联做法。1931年4月,国民党中央会决定设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很大程度上是受苏联影响的结果。是月17日,宋子文在谈到设置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原因时说:“世界大

战后,欧洲各国均有经济委员会之组织,以计划全国整个的经济事项。苏俄方面亦有最高经济委员会之组织,以实现其五年的经济计划。中国方面社会情况虽与苏俄不同,但为谋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不能不设立统筹的机关。”^⑨由此可见,苏联的做法在宋氏心中占据很大分量。

此外,还有论者对苏联经济建设的不足作了理性化的反思。《大公报》于1931年9月28日在报道中指出了苏联计划指标过高的问题。报道说,苏联计划1931年重工业生产增加46%，“太为急进”,许多重工业领域实难以完成生产任务,“如与去年较,大体皆有进步,主要工业生产之增加,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之间,实为一年中之大收获,但距百分之四十六则仍甚远”。^⑩谷春帆反思了苏联低价向国际市场倾销产品以换取购买工业设备外汇的做法。他于1932年3月5日指出,苏联向国际市场低价倾销粮食等消费品,导致国内粮食、日用消费品奇缺,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无论农民与工人,其生活程度,均至恶劣”,“工人群众,则以农民不愿出售农产之故,以政府必需输出农产之故,反常有冻馁之威胁”。而且,这种倾销政策面对各国的关税壁垒,也不可能长期持续,“若他国以相等于各该国生产成本较贵之数额作为进口税而征收之,则苏联之廉价商品亦将无从销售,借令勉强销售,而苏联劳动价值之牺牲太大,所能交换之外国产品过少,不待国际资本主义组织之破坏,而苏联之社会生产组织先将扫地矣”^⑪。李陵认识到了苏联向集体农场强制低价征收公粮制度的弊端之所在。1933年5月10日,他分析,苏联政府硬性规定向集体农场征收公粮的指标和价格,未考虑当年农业生产的丰歉与否,强行按预定的指标进行征收,且价格极低,“此种价格恒较市价

低至十倍以上”，“以是，农民恒破坏其所贮藏之谷物，屠杀其牲畜，以作消极的抵抗。粮食损失，颇属不少”，“此种过度征收，足以损害农民生计，扑灭农民努力耕种之欲愿，减低农民贮畜之兴趣”^⑧。1936年12月1日，袁孟超分析了苏联一五计划重工业与轻工业发展失衡的问题。他强调，苏联一五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造成日用品供应紧张，民众生活困难，“如果重工业发展在先，必然会形成日常必需品的缺乏，使全国民众的生活极感困难”^⑨。

综上所述，在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实施高歌猛进而中国经济日显衰落的情况下，国人对苏联经济建设形成仰视心理，并由此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表现出好感。在此种心理下，国人不仅主张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尤其对苏联人民艰苦奋斗的建设精神表现出极大兴趣。国人对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另一个心理反应，就是以苏联为例证，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国民党当局虽将苏联经济发展视作对中国的威胁，但又在实际事务中不乏借鉴苏联做法之举。虽然国人总体上羡慕苏联经济建设，但不乏理性反思，只是这种反思呈现零星、表浅化状态。

小结

苏联经济建设信息在1930年代中国的社会传播面广泛，亦非常深入，并产生了巨大的舆论效应。信息传播人群既涉及各类访苏人士、报刊记者和编者，也涉及知识界人士、实业界人士，还涉及国民党当局官员及其他社会人员。这些社会人群之间的信息传播是交互的，他们往往既是信息传播者，也是信息接受者。国人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信息的传播，有其特定的时代视角、倾向和国别语境。尤其是，身处民族和国家危难之际的国人

看到1929年经济危机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与苏联五年计划高歌猛进之间的巨大反差，急于寻求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热切希望中国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举国一致、艰苦奋斗的建设精神。苏联经济建设成就对国人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在中国社会各界形成一股以苏联经济建设为榜样的思潮。不过，受苏联对外宣传的影响，再加上信息的有限性，以及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对苏联一五、二五计划建设存在的弊端认识尚不足，国人对于苏联经济建设的认知不免存在相当的片面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发展成功之路由此进入中国建设工业化国家发展轨道的预盼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将为之而奋斗！

注释：

①《国际生丝会议代表韩有刚谈此行感想》，《大公报》(天津版)1930年8月4日。

②《世界动力会议经过——李彦士、沈嗣芳回国后之报告(续)》，《大公报》(天津版)1930年9月9日。

③人佣：《从苏州说到上海，火车辘辘中畅说欧洲》(14日寄)，《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7月18日。

④萧淑宇：《苏俄的新兴工业及其经济建设之情况》(5月20日自柏林寄)，《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6月7日。

⑤夏鸣：《读〈苏俄的新兴工业及其经济建设之情况〉的感想》(6月10日自南京寄)，《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6月17日。

⑥丁文江：《苏俄旅行记(十六)》，《独立评论》第156号，1935年6月23日。

⑦蒋廷黻：《欧游随笔(二)》，《独立评论》第124号，1934年10月28日。

⑧惜梦：《海参崴拘留记》，《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9月3日。

⑨《苏俄边境流亡记》，《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4月16日。

⑩郭建英：《梅剧团游俄记实——在西伯利亚途中》，《大

公报》(上海版)1936年5月1日。

⑪曹谷冰:《赴俄特派员第四信——苏联儿童教育之一瞥》(4月7日寄自莫斯科),《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4月26日。

⑫《牛兰案》(社评),《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9月5日。

⑬丕士:《实业经济调查团应研究苏俄》(莫斯科特别通信,4月6日),《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5月16日。

⑭丕士:《中俄商务关系(续)》(寄自上海),《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6月18日。

⑮《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社评),《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6月4日。

⑯《莫德惠回国与中苏交涉》(社评),《大公报》(天津版)1930年12月28日。

⑰季廉:《世界钢铁恐慌与中国经济建设》,《大公报》(天津版)1937年5月19日。

⑱《苏俄中执会开会》,《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月7日。

⑲《苏俄中执委闭幕》,《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月16日。

⑳《苏俄发表第二五年计划》,《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1月28日。

㉑《苏联中央执委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央日报》1936年1月13日。

㉒《苏联经济计划本年度后半期内容决定》,《中央日报》1936年6月19日。

㉓漆珙生:《苏联经济建设的现状及其最近计划》(1936年5月31日),《中苏文化》第1卷第2期,1936年6月15日。

㉔钱穆:《以国防为基点之苏联经济建设》(1936年11月25日),《中苏文化》第1卷第7期,1936年12月1日。

㉕陈羲伯:《苏联的肃清文盲运动》,《中苏文化》第2卷第8期,1937年8月1日。

㉖中苏会议系中、苏两国政府为处理1929年“中东路事件”而进行的外交谈判。中方派出以莫德惠为首的代表团于1930年5月抵达莫斯科,与苏联以加拉罕为首的代表团于同年10月开始正式谈判。会议涉及中东路、两国通商、恢复外交关系等问题。中苏会议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无果而终。

㉗《莫德惠昨过津入京》,《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2月2日。

㉘《召莫归国之谜》,《大公报》(天津版)1930年10月31日。

㉙《几经研究之对俄方案,一部分复交论者之主张》,《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2月18日。

㉚《蒋作宾离俄归国》,《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4月17日;《俄人精神至为可惊》,《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4月28日。

㉛《颜使游南俄,参观工业中心区》,《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8月24日。

㉜《颜惠庆谈日俄关系》,《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9月21日。

㉝《车中纵谈赴新经过》,《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11月9日。

㉞《吴霭辰谈新疆现状》,《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4月9日。

㉟《杨杰一行昨晚赴波兰》,《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3月9日。

㊱《徐、俞一行离俄赴波兰》,《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10月15日。

㊲《土西铁路之完成与中俄关系》,《俄罗斯研究》第5/6号合刊,1930年7月25日。

㊳《经济建设与外资——孙科在国府纪念周之演说》,《大公报》(天津版)1930年12月21日。

㊴《曾仲鸣:《铁展之意义与希望》》,《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5月20日。

㊵《十九年度财政报告书(续)》,《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3月22日。

㊶《国际贸易局公布上年度之国际贸易暨国内经济情形》,《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5月8日。

㊷《简报》,《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4月9日。

㊸《建设西北——朱绍良等发起组西北建设促进会》,《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1月13日。

㊹《千佛山麓童军大露营》,《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10月19日。

㊺《太原举行造产运动》,《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9月23日。

㊻《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三届年会纪事》,《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11月。

㊼《翁文灏:《我的意见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15号,1932年8月28日。

㊽《蒋廷黻:《这一星期》》,《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日。

㊾《陈之迈:《统一的基础》》,《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

- 月6日。
- ⑤⑩李权时:《介绍研究苏俄五年计划的五本英文书》,《经济学季刊》第3卷第1期,1932年5月。
- ⑤⑪洪范:《中日经济提携》,《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8月28日。
- ⑤⑫鲍觉民:《经济建设与水力利用》,《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12月16日。
- ⑤⑬《东北矿学会第二届年会交相砥砺,语多沉痛》,《大公报》(天津版)1930年10月29日。
- ⑤⑭《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昨赴湘游览》,《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9月2日。
- ⑤⑮镜剑生:《赴日参观记(第三信)》,《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5月9日。镜剑生,李烛尘笔名。
- ⑤⑯许冠群:《国难时期与劳资纠纷》,《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10月10日。
- ⑤⑰《沈耀庭赴俄研究缝纫机》,《大公报》(上海版)1937年4月15日。
- ⑤⑱维一:《教务会议》(8月26日),《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8月31日。
- ⑤⑲龙孙:《土敏土》(书报介绍),《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11月18日。
- ⑤⑳张央:《莫斯科情网(Moscow Night)》(影评),《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11月15日。
- ⑤㉑《广播无线电今日节目》,《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4月12日。
- ⑤㉒《〈苏俄视察记〉再版启事》(广告),《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8月28日;《〈苏俄视察记〉三版启事》(广告),《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1月6日;《苏俄视察记》(广告),《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1月4日。
- ⑤㉓《苏俄视察记》(广告),《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5月19日。
- ⑤㉔《爱读〈苏俄视察记〉者注意》(广告),《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1月22日;《北马路谦祥书局发现翻版书籍极多》,《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5月18日;《平市翻版书机关》,《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6月2日;《翻版书籍,太原亦有机,已被破获究办》,《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12月28日;《翻版书又查获一批》,《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2月19日;《法租界查获翻版书》,《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5月7日。
- ⑤㉕历樵:《津锡纪行》(16日于无锡),《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2月22日。
- ⑤㉖《世界经济萧条怒潮中苏俄为繁荣之孤岛》,《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1月4日。
- ⑤㉗吴辰仲:《张肇融著〈国际问题〉》(书评),《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1月31日。
- ⑤㉘于苇:《建设进程中之苏联的农业》,《中苏文化》第1卷第4/5期合刊,1936年10月15日。
- ⑤㉙方秋苇:《论苏联农业之集体化》,《中苏文化》第2卷第3期,1937年3月1日。
- ⑤㉚穆藕初:《复兴中国国民经济之唯一途径》(星期论文),《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9月13日。
- ⑤㉛张其昀:《廿五年来之河北》(星期论文),《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10月12日。
- ⑤㉜朱惠之:《论苏联工业建设的经验与中国经济建设——献给中国国民经济建设之运动者》,《中苏文化》第2卷第4/5期合刊,1937年5月1日。
- ⑤㉝汪惠波:《粮食统制方案》,《经济学季刊》第8卷第1期,1937年5月。
- ⑤㉞高永晋:《现在国人可以觉悟矣》,《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0月2日。
- ⑤㉟《送民国二十年》(社评),《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2月31日。
- ⑤㊱天民:《全民起负救国责任之先决条件》,《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2月12日。
- ⑤㊲《战争恐怖与国际趋势》(社评),《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10月11日。
- ⑤㊳张毓宾:《苏俄五年计划与远东之关系》,《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1月15日。
- ⑤㊴《建国雪耻之一大问题》(社评),《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3月28日。
- ⑤㊵《演变中的太平洋——胡适昨晚之讲演》,《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12月4日。
- ⑤㊶钱穆:《以国防为基点之苏联经济建设》(1936年11月25日),《中苏文化》第1卷第7期,1936年12月1日。

- ②谢世珍:《苏联的教育》,《中央日报》1937年2月23日。
- ③吴景超:《中国的人口问题》,《独立评论》第225号,1936年11月1日。
- ④袁孟超:《以武力为后盾之和平政策》,《中苏文化》第1卷第7期,1936年12月1日。
- ⑤黄甘棠:《苏联二十年来工业建设之成果》(1937年4月20日脱稿于上海),《中苏文化》第2卷第4/5期合刊,1937年5月1日。
- ⑥《论多难兴邦》,《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1月29日。
- ⑦俊林:《平浦道上》,《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4月23日。
- ⑧荒野:《半封信》,《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9月20日。
- ⑨《民国二十三年国庆纪念辞》,《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10月10日。
- ⑩《乡村工作讨论会决定进行方针》,《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10月16日。
- ⑪吴景超:《积极的政策》(星期论文),《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11月3日。
- ⑫编者:《我们到那里去》,《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4月9日。
- ⑬何廉:《我国今日之经济地位》,《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1月16日。
- ⑭《苏俄气球同温层飞升成功》,《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2月1日;《苏俄航空三勇士身后哀荣》,《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2月3日。
- ⑮梦:《编余·伟大起来》,《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2月8日。
- ⑯陈谷声:《中国的钢铁问题》,《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11月11日。
- ⑰徐东林:《对〈大公报〉持论态度的批评》(1931年10月15日于辽宁省盖平县),《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0月22日。
- ⑱《苏联十五周年》(社评),《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11月7日。
- ⑲《李维诺夫呼吁经济休战》,《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6月16日。
- ⑳《开口便是宣传》(短评),《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6月16日。
- ㉑《俄大使演辞,昨宴报界时发表》,《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7月7日。
- ㉒《我们浪费光阴了!》(短评),《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7月8日。
- ㉓芸:《农村城市的不均衡》(短评),《大公报》(天津版)1930年8月25日。
- ㉔《乌克兰饥荒》,《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4月21日。
- ㉕《国际简讯》,《大公报》(天津版)1934年6月3日。
- ㉖曹谷冰:《赴俄记者第十六信——最大水电厂克起卡斯发电厂参观记》(5月16日寄自克起卡斯),《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6月4日。
- ㉗用三:《东鳞西瓜(其二)》,《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2月5日。
- ㉘振:《碎石》,《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8月5日。
- ㉙菁如:《最普遍的燃料,煤油市场的竞争》,《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5月13日。
- ㉚曹谷冰:《游俄印象记(一)》,《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7月10日。
- ㉛黄甘棠:《苏联二十年来工业建设之成果》(1937年4月20日脱稿于上海),《中苏文化》第2卷第4/5期合刊,1937年5月1日。
- ㉜秦涤清:《苏联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中苏文化》第2卷第4/5期合刊,1937年5月1日。
- ㉝《有感》(短评),《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4月30日。
- ㉞《段祺瑞主张日本交还东北,始有直接交涉之余地》,《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1月28日。
- ㉟《蒋作宾过沈谈话,对俄应彻底研究》,《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4月30日。
- ㊱《广西建设经过与三自三寓政策》,《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9月12日。
- ㊲《林主席讲自力更生》,《大公报》(天津版)1937年1月3日。
- ㊳《建国运动与世界大势》(社评),《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1月5日。
- ㊴丁洪范:《经济建设与资本的强制积储》,《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10月28日。
- ㊵孙洁人:《中国工业诸问题之研讨》,《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4期,1936年1月。
- ㊶杨学通:《利用外资问题之过去与将来》,《大公报》(天

津版)1936年7月29日。

⑳吴鼎昌:《国难中之衣食住问题——三月二十一日首都讲演会演说稿(续)》,《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3月30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实业部长吴鼎昌演讲》,《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6月19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会昨举行成立大会》,《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7月5日。

㉑陈行:《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1936年11月。

㉒《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社评),《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6月4日。

㉓连士升:《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和资料》,《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10月9日。

㉔吴铁峰:《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及其现势》,《中苏文化》第2卷第1期,1937年1月1日。

㉕《蒋主席国议开幕致词全文》,《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5月8日。

㉖《国际现状——蒋作宾在外部报告》,《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5月20日。

㉗《宋子文谈经济委员会》,《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4月18日。

㉘《本年苏联工业生产落,较原定增加率相差甚远》,《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9月28日。

㉙谷春帆:《中日现局与世界战争》,《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3月5日。

㉚李陵:《苏联农业集体化概况》,《大公报》(天津版)1933年5月10日。

㉛孟超:《苏联政党发展史概论(续完)》,《中苏文化》第1卷第7期,1936年12月1日。

The Effect of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in 1930s' China about Soviet Union's Economic Constructive Achievement

Yan Shuqin

Abstract: In 1930s, there was a trend of thought of taking the Soviet Union'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in Chinese society. This trend of thought grew out of the effect of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in China about Soviet Union first and second five-year plan's constructive achievement. The dissemination and audiences of Soviet Union's economic constructive information were involved in people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Disseminating Soviet Union's economic constructive information, people had specific visual angles, inclinations and contexts. Soviet Union's economic constructive information has brought strong thought reactions in all kinds of social personnel. In the national crisis caus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people advocated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s economic constructive experiences to accelerat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the Soviet Union's economic constructive information which Chinese people disseminated was quite one-sided. However, the CPC will strive for the predetermined goal that China's successful transition into a industrialized nation.

Key words: 1930s; Soviet Union's economic construction; China's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